

# 农户贫困的性别差异及多维指标建构

## ——基于黎母山镇贫困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陈丽琴

〔摘 要〕 基于多维贫困视角,对海南琼中黎母山镇的贫困数据遵循贫困维度指数的选取、指标权重的选择、指标加总的行文逻辑构建了不同性别的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指数表征了不同性别的农户贫困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教育、健康、经济、闲暇、社会地位和决策权等六个方面,而其中妇女的决策权贫困尤其突出。不同性别的农户多维贫困指数为政府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一些参考:用好多维贫困大数据,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建立农户多维贫困识别标准,使扶贫工作更加精细化;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农户的脱贫需求为导向,使政府扶贫工作的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与融合;分性别进行多维贫困指数的统计,关注多维贫困的性别差异,针对不同性别采取有效措施,为精准扶贫和性别平等助力。

〔关键词〕 多维贫困;性别贫困差异;精准扶贫

### 一、问题提出

精准扶贫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结合国家扶贫实际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又指导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书写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故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强化社会合力,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运用科学有效方法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回顾过去,扶贫工作成就斐然,展望未来,脱贫工作仍任重道远。

在我国已进入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背景下,以收入作为贫困和脱贫的单一衡量标准已经不能精准地反映农户的贫困全貌。多维贫困、能力贫困正逐渐成为精准贫困研究的热点,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农村贫困的实际状况和扶贫效果来切入,指出在现阶段中国贫困特征发生改变的大背景下,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更具科学性和精确性(王小林、Alkire,2009);周慧、文娟(2018)则从实践出发,对湖南省 72 个县进行生活、健康、教育等多维度贫困的测量及分解,结果表明多维标准测度的

陈丽琴,管理学博士,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口 570228)。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土地政策实施的减贫效应研究”(17XZZ002)的阶段性成果。

贫困户和以收入为单一标准的识别贫困户之间存在误差,导致了贫困对象的识别不“精准”;邹薇和方迎风(2011)对农村的贫困状况进行多维度测量,发现多维贫困程度比收入贫困更严重、返贫波动性更大,提出只有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着力提高贫困主体的抗风险能力,才能化解再次返贫的风险。

二是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对农村进行的多维贫困研究。杨军等(2017)对山西省县域农村多维贫困进行测度,指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区别对待“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杨龙和汪三贵(2015)对农户贫困数据进行监测,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特征,指出政府应从贫困地区的特征出发选取贫困指标及权重来考察多维贫困,从而选择有针对性地扶贫措施,才能优化扶贫效果。

三是从社会性别视角来专门研究女性的贫困问题。吴海涛等(2013)指出我国的贫困理论研究和精准扶贫实践都缺乏性别视角和性别敏感,因此,需要融入性别视角重新理解和认知不同性别的贫困。

总体来说,当前从多维度视角来度量性别贫困的研究比较缺乏。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国家的扶贫体系是以家户为单位进行的,一个家庭中的成员贫困状况往往被视为“均质”的,在家庭成员之间不会因为性别而存在贫困差异。但事实并非如此,家庭成员并非社会资本均等和社会资源均质的联合体,事实上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由于多种原因在资源获取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上都处于劣势,再加上传统的性别观念,有可能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扶贫政策中忽视了不同性别在家庭中资源获取的不平等性和扶贫受益中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导致了女性的扶贫需求和扶贫权益被漠视。

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六个精准”不仅是精准到户,更要精准到不同性别,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中央要求的“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实行逐户销号,做到脱贫到人”的总目标。因此,从性别视角来研究农户的性别贫困差异,从多维指标来度量不同性别的贫困表现和探究贫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于到期实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宏伟目标,构建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促进男女平等和社会公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运用最近两年在海南调研的系列数据,结合多维贫困的理论和测量方法,设置了教育、经济、社会、决策权、闲暇和健康六个维度十个指标来测量了不同性别农户的贫困指数,对农户性别贫困差异进行了分析,指出精准扶贫既要有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也需要有不同性别贫困的精准识别。

## 二、农户性别贫困差异的理论分析

### (一) 贫困理论

研究农户贫困和精准扶贫策略,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对贫困的识别,只有精准的识别贫困人口和致贫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扶贫;否则,扶贫就会因为失去其“精准性”而效果大打折扣。但是,贫困和贫困的识别并不是简单清晰的,“如果许多贫困的事情是一目了然的,能认识原本意义上的贫困并理解其原因,我们就根本不需要精心设计的判断准则、精巧定义的贫困度量和寻根问底的分析方法。……但是,并非所有关于贫困的事情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认识,甚至对于贫困的判断都变得模糊不清。”(阿玛蒂亚·森,2001)

贫困的识别之所以困难,原因在于“贫困”概念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不同的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产生了“匮乏说”“能力说”“排斥说”与“地位说”等诠释,尽管莫衷一是,但都承认贫困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家庭背景、环境等多种因素于一身的复杂结果,那种以经济收入作为唯一或主要标准的识别手段由于忽略了贫困的非货币性质,忽视了贫困背后的能力、机会、权利等多维度差异而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于是,很多学者开始引入阿玛蒂亚·森的多维贫困理论来分析致贫的各种原因。多维贫困理论是指贫困不应该仅仅只局限于

收入水平的低下或物质的匮乏这些以经济标准衡量的单一指标,同样应该表现在个人发展机会的缺失和能力的贫困上。2010 年联合国计划署与牛津大学联合推出了多维贫困指数,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来测量贫困,并对三个测量维度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拓展,使之更符合贫困的现实情况(张全红等,2015)。

目前,贫困测量标准和多维贫困指数随着国内外贫困理论研究的深入向着更全面、更广泛和更细化的方向发展,已经从以单一的收入或支出为标准发展到以公共产品的提供和享有教育、住房条件、决策权力、健康状况等层面的多维视角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类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

## (二) 政府管理精细化理论

政府管理精细化理论主要是吸收企业精细化管理理论发展起来的,是以科学管理为基础,以精细操作为特征,致力于在每一个细节上精益求精,力争效果最佳,在操作上具体表现为“精”“准”“细”“严”。“精”是目标,服务与管理最精,追求扶贫效果的最佳、最好、最优化;“准”是准确,是信息情报数据准确无误,对人、对事、对原因判断无误,决策、计划、政策制定准确;“细”是把工作做细,管理、服务和执行细化,注重细节,注重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与实际情况;“严”是严格执行标准,严格监管,控制偏差,衔接配合精细化。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对政府管理精细化要求尤其突出,因为扶贫工作无小事,是一场硬战、长久战、持久战,关注的是让贫困户在生活中“闹心”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看似平常而琐碎的“小事”,这需要扶贫干部事无巨细,有耐心、细心、诚心、热心地去实地走访、去聆听、去交流、去沟通,能够因人因地施策、因致贫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达到习总书记要求的目标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举措明确的精准扶贫要求。

# 三、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一) A-F 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的模型构建

A-F 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是由 Alkire 和 Foster(2011)两位学者提出,它从经济、教育、环境等多个维度提出贫困指标,运用加总和分解等方法,按照性别、地区等不同的组别对其进行分解来测算不同指标的贫困值。

A-F 方法具体运用如下。第一步:选择贫困维度指标,然后给每个维度指标设置一个“贫困线”,如选择收入作为测量贫困的一个维度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公布的每人每年 2300 元的标准即“贫困线”,那么农户收入达不到这个贫困线就意味着在这个维度指标上是贫困的……以此类推来测算每个维度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第二步,设置权重,每个样本可能在不同的维度指标上处于不同的贫困,而每种贫困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为每个维度赋予不同的权重值;第三步,分指标测算出来后,再假定多维贫困的阈值(cut-off),即家庭或个体如果几个维度指标达不到最低标准就意味着该家庭或个体在这个阈值上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假设  $1/3$  是衡量多维贫困的阈值,如家庭或个体在  $1/3$  的维度上处于贫困状态,那就陷入了多维贫困;第四步,结合数据测算,如果选择  $n$  个样本就多个不同维度的贫困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并取值,多个维度的数据进行统计所得数据就能形成样本观测矩阵;同时,根据每个维度设定的贫困标准来识别每个样本在该维度上是否贫困,从而得到一维贫困剥夺矩阵;第五步,再根据 A-F 多维贫困公式计算出样本在各个维度处于贫困状态时不同贫困维度的总和,即多维贫困剥夺矩阵;在此基础上,测算出“多维贫困发生率”(H-Headcount ratio),同

时可测得“多维贫困剥夺强度”(A-Intensity of Deprivation),这两个指标反映了多维贫困人口遭受剥夺的平均百分比;最后,将两者相乘即得到多维贫困指数(M0-Adjusted Headcount Ratio),即经过贫困强度调整后的多维贫困人口百分比。

A-F 测量方法比早期的多维贫困测量指数更加准确和细致,能够运用多个维度的数据,并且这些维度通过赋予不同指标和采取不同权重来综合测算多维贫困指数,通过比较分析能够具体研究各个维度贫困的贫困指数和致贫因素。因此,A-F 测量方法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多维贫困研究,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从 2010 年起每年就利用该方法来测算 100 多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指数。

(二) 指标选取

在 A-F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中,贫困维度指标的选取是测量不同性别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差异的关键环节,所以选取的各维度指标既要能反映农户整体贫困的客观现实,也要能区分不同性别农户间的贫困。笔者根据美国学者 Scheyvens(2000)年提出的政府扶贫策略中性别赋权的四维度分析模型和国内学者吴海涛、丁士军(2013)提出的教育、收入、消费、闲暇、健康、决策权的六个维度测量模型,确定采用教育、经济、社会、决策权、闲暇和健康六个维度十个指标来进行不同性别的贫困指数测量。在设定权重时,给予六个维度均等的权重,每个维度内的各个指标也设定相等的权重(如表 1 所示)。

表 1 维度和指标设定表

维度	评价指标 d	贫困线及赋值(0 或 1)	权重
教育	教育年限 d1	完成 9 年义务教育;未完成则赋值 1	1/6
健康	疾病 d2	没有重大疾病或疾病支出很少;有重大疾病赋值为 1	1/12
	医疗保险 d3	参加新农合医疗保险;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则赋值为 1	1/12
经济	收入 d4	人均年纯收入 2300 元;不足则赋值为 1	1/12
	技能 d5	拥有生产性资源或掌握一技之能;没有则赋值为 1	1/12
社会	尊重 d6	能够获得社会或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没有则赋值为 1	1/6
闲暇	闲暇时间 d7	闲暇和睡觉时间之和不少于 10 小时;没有达到则赋值为 1	1/6
决策权	家庭中的决策权 d8	在家庭重大事务中享有决策权;没有则赋值为 1	1/18
	户代表 d9	在村庄事务中作为户代表参与决策;没有赋值为 1	1/18
	村庄事务的参与度 d10	积极参与村庄事务,在村庄重大事务决策中声音能够被听见;没有则赋值为 1	1/18

(三) 数据来源

为了测量不同性别多维贫困状况,课题组于 2018 年 3—4 月在海南省琼中县黎母山镇进行了相关调查和数据统计。琼中县作为海南省下辖的黎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海南岛中部,是海南省重点扶植发展的贫困县之一。在 2018 年,全县共有贫困户 1770 户,其中黎母山镇有贫困人口 5822 人,包括正处于贫困中的 4347 人,和已经脱贫但需要巩固提升的 1475 人,计划在 2019 年年末全部脱贫。<sup>①</sup> 课题组在黎母山镇调查农户共 134 户,调查的农户中有当地政府建档扶持的贫困户 84 户,占调查户的 62.7%,超过一半,非贫困户 50 户,比例为 37.3%;调查人口为 516 人,访谈男性为 234 人,所占比例为 45.4%,女性为 282 人,所占比例为 54.6%;调查人员中最大年龄为 67 岁,最小年龄为 19 岁,平均年龄为 43.3 岁;调查内容主要为农户家庭基本信息、经济、教育、健康等以上六个维度所涉及到的内容。

<sup>①</sup>数据来自《中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办公室文件(琼中办发[2018]15 号)》。

#### 四、农户不同性别多维贫困的实证结果分析

##### （一）各维度贫困发生率

表 2 反映了利用 A-F 模型所测量的农户人口总体以及分性别的个体在六个考察维度的贫困发生率。调查人口总体教育贫困率比较突出,高达 74.7%,这个数据说明了大部分农村家庭成员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受教育水平最高为初中或初中以下,而其中女性的教育贫困率更是高达 81.7%,比男性高出 14 个百分点,说明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面,女孩的辍学率比男孩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当地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总体健康贫困率比例很小,只有 11.8%,男性与女性的占比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分别为 10.2% 和 11.4%,主要是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本覆盖了每一户和每个人。总体经济贫困发生率为 73.1%,高于课题组所调查的总户中当地政府建档建卡扶持的 62.7% 贫困户,说明有部分农户虽然收入不在国家贫困线下,但自认为收入处于贫困水平;其中,女性的收入贫困发生率同样高于男性,占比 78.9%,高于男性 67.2% 的百分比。调查人口总体闲暇贫困发生率为 20.5%,女性为 26.7%,男性为 14.2%,男女两性闲暇贫困有 12.5% 的较大差距。课题组对此差别进行第二次深度访谈,得知女性之所以比男性闲暇时间少主要是在农忙之余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包括照顾孩子。当夫妻俩从田地劳作回来后,男性可以马上进入闲暇状态,但女性还不得不做饭、洗衣、带孩子等,在家庭继续忙碌。从社会维度来考察贫困状态,总体贫困为 31.7%,男性贫困率为 28.5%,低于女性的 34.8%,说明男性获得的社会尊重度要高于女性。决策权贫困主要发生在女性中,女性决策权贫困率高达 67.3%,主要是在家庭中作为户代表的大部分是男性。

通过综合分析,得知女性整体性别贫困指数要高于男性,尤其在教育、闲暇、决策权三个维度,高出男性比例均超过 10%,这说明女性在社会资源获取和家庭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维度贫困发生率统计(%)

维度	总体	男性	女性
教育	74.7	67.7	81.7
健康	11.8	10.2	11.4
经济	73.1	67.2	78.9
闲暇	20.5	14.2	26.7
社会	31.7	28.5	34.8
决策权	35.1	2.9	67.3

##### （二）多维度贫困测量结果

为了综合评价不同性别的贫困状况,本文利用 A-F 模型计算了不同维度数下的贫困发生率 H 和贫困剥夺强度 A,并以此推算出多维贫困指数 M。从表 3 可以分析,当考虑一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时,男性的贫困发生率为 0.859,即 85.9% 的男性存在以上 10 个考察指标中的任意一个维度指标的贫困,即如果只有一个维度不满足要求就意味着贫困,那男性的贫困率为 85.9%;女性的一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为 0.992,意味着有 92.2% 的农村女性存在着以上 10 个考察维度指标中的任意一个维度指标的贫困。当然,随着贫困维度数的逐渐增多,男性和女性的贫困发生率都在下降;当贫困维度临界值为 4 时,男性的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为 22.4%,女性则为 43.4%;当维度临界值为 7 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贫困发生率都低于 5%;而且男性和女性都没有人在 9 个指标维度上都处于贫困状态。综合分析不同维度数下不同性别的贫困发生率,可以得知男性大多数在 3 个维度处于贫困状态,而

女性大多数在 4 个维度处于贫困状态(如表 3 所示)。

表 3 男性和女性多维贫困统计结果

维度数 k	男性			女性		
	贫困发生率 H (K)	贫困发生份额 A (K)	多维贫困指数 M (K)	贫困发生率 H (K)	贫困发生份额 A (K)	多维贫困指数 M (K)
1	0.914	0.43	0.393	0.963	0.512	0.493
2	0.742	0.362	0.269	0.841	0.451	0.379
3	0.513	0.297	0.152	0.632	0.412	0.260
4	0.337	0.241	0.081	0.547	0.382	0.209
5	0.201	0.221	0.044	0.412	0.337	0.139
6	0.156	0.184	0.029	0.354	0.307	0.107
7	0.245	0.142	0.035	0.226	0.214	0.048
8	0	0	0	0.112	0.123	0.014
9	0	0	0	0.066	0.118	0.008
10	0	0	0	0	0	0

男性和女性都没有人在 9 个指标维度上都处于贫困状态,说明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户在医疗合作、闲暇等方面较之以前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同时,贫困维度临界值也显示了农户的贫困集中在生产资源或技能和教育贫困上。生产资源或技能和教育这两个维度的贫困贡献率间接说明了贫困农户在脱贫过程中存在脆弱性和易损害性。因此,政府需从多个维度出发来提升扶贫效率和巩固扶贫效果,其中提高农村教育整体水平和帮助农户获取新生产资料或新技能是当前农村精准扶贫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高农户家庭或个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是提高经济收入减少贫困的治本之策。

(三) 不同维度对总贫困的贡献

根据实证资料和统计数据,在分步骤测算各个维度的单个指标贫困发生率 H 的基础上,对维度进行分解,得到各个指标对贫困的不同贡献率(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维度单维贫困发生率及各维度对贫困的贡献率(%)

性别	维度	教育	疾病	医疗保险	收入	生产资源或技能	闲暇时间	尊重	家庭重大事务中的决策权	户代表	村庄事务的参与度
男性	贫困发生率 H	67.7	10.2	0	58.23	76.17	14.2	28.5	1.4	1.3	6.0
	维度贡献率 I	25.67	3.87	0	22.08	28.89	5.38	10.80	0.53	0.49	2.28
女性	贫困发生率 H	81.7	11.4	0	72.2	85.6	26.7	34.8	42.7	95.1	64.1
	维度贡献率 I	15.89	2.22	0	14.04	16.64	5.19	6.77	8.30	18.49	12.46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各个维度上都有贫困现象发生,对男性来说,贫困维度贡献率指标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最大的前三项依次是生产资源或技能、教育和收入贫困;对女性来说,贫困维度的贡献率各指标之间相对较平均,有五项都超过了 10%,排在前三位的指标依次是户代表、生产资源或技能和教育。可以说,无论是单向指标测量还是整体指标评价,女性的贫困指数都要高于男性,这不仅仅反映在经济收入上,而且反映在健康、闲暇、决策权等多个维度,说明女性贫困程度较男性更高,脱贫更艰难;特别是在决策权维度,男女两性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1.4% 与 42.7%,性别差距甚大,说明女性在家庭决策或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处于边缘地位,这可归应于社会文化、村庄惯习等多种因素。但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无疑会导致她们在扶贫资源的获取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在“农业女性化”和“女性农业化”的乡村振兴背景中,农村精准扶贫政策能否在促进女性可持续发展方面找到政策突破口,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等具体举措中进行性别倾斜和兼

顾性别利益,增加女性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发展受益程度,将对减轻女性贫困和提高扶贫的精准度会有直接作用。

## 五、政策建议

基于多维贫困视角,从整体情况分析,可以得出课题组所调查的农户 100% 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这既得益于国家和海南省健康脱贫的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能有效减少“因病致贫”的概率。从贫困的贡献率看,生产资源或技能、教育贫困在各项指标贫困中都排在前两位,在生产资源或技能这项指标上,男性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贡献率分别是 76.17% 和 28.89%,女性为 85.60% 和 16.64%;在教育贫困指标中,男性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贡献率分别是 67.70% 和 25.67%,女性为 81.7% 和 15.89%。这说明农户的贫困最主要的不是由于经济收入少而带来的暂时贫困,更多的是由于教育、生产资源或生产技能的匮乏而带来的生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足,从而带来了经济收入的贫困。精准扶贫的核心是“精准”二字。因此扶贫首先是要找准致贫的原因,这样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有的放矢,才能精准帮扶。具体到课题组基于多维贫困维度所调查的总体数据和分性别统计的贫困情况,对今后的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建议如下:

### (一) 用好大数据,打好精致脱贫攻坚战

“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习总书记的这段话为用好大数据、赢得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发展的战略指明了方向。众所周知,数据包含多层次的丰富信息,如果对数据进行不同层面和维度的剖析,选择利用好数据所隐含的信息,就能让数据发出不同的声音。大数据催生精细化管理,在实践中,如何综合地多层次有效利用数据来进行精准扶贫,对当地政府部门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当地政府、扶贫组织应该注重多维贫困数据的收集、分析、使用和上报,从性别、年龄、健康、生产资源获取状况和主要致贫原因作分门别类的统计,从而为制定扶贫脱贫措施提供准确依据;同时,在实际操作中盘活现有的数据资产和提高数据的综合分析运用能力,坚持用数据说话、用数据推进管理、发挥数据创新能力,为精准扶贫提供数据支撑。

### (二) 建立农户多维贫困识别标准

目前,我国主要是以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是否达到国家最低线为衡量贫困与否的标准,这种标准简单易操作,能提高扶贫工作效率,但在实际工作中有可能带来的是地方干部简单提高农户暂时收入以应付上级检查的短视扶贫中。如能以农户年纯收入标准为主要贫困识别标准,再辅之以其他多维指标来识别贫困户并以此建档立卡,从农户多维贫困指标着手来有针对性地扶贫,才能真正做到精准扶贫,促进贫困户脱贫的可持续发展。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表明教育的匮乏和难以获取新的生产性资源或技能是导致农户贫困的最主要原因,这种脆弱性贫困<sup>①</sup>即使短期内脱贫成功也潜藏着重返贫困的风险。Scott(1976)曾经用“水深齐颈”形象地表述了农户的生存边缘位置,即使是外界一丝丝的细波微澜也可能会带来整个家庭重返贫困甚至面临无法生存的境遇。

因此,建立农户多维贫困识别标准能更周到地把农户的脆弱性贫困纳入到精准贫困的长远计划中,研究农户贫困的非经济性因素、培养他们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才是精准扶贫可持续发展的长久

---

<sup>①</sup>脆弱性贫困包含两层核心含义:一是关于收入的风险和变化,穷人的生活会因国家经济波动、时令变化和各种危机而受到很大影响;二是穷人由于教育水平的低下或技能的匮乏,而缺乏其他选择,基本没有防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使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大大增加,因病返贫、因学返贫的概率很大。

之计。当地政府在扶贫过程中应在教育、生产资源的提供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让农户在生计策略上能够选择多样化的经营方式对现有资源进行最优配置,达到生存能力的帕累托改善,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真正做到“造血式”扶贫。

### **(三) 加强政府扶贫管理精细化,从供给侧改革,以农户的需求为导向,使扶贫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提高扶贫的“精准”程度**

政府扶贫精细化管理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重细节、重过程、重基础、重具体、重落实、重效果,在每一个细节上精益求精,力争最佳。因此,精准扶贫的实效不仅仅依赖于扶贫主体的供给资源,更取决于扶贫对象的主观需求是否与供给相一致。在精准扶贫中,如果忽视了各贫困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和实际情况,只从供给者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扶贫效果肯定会打折。所以,在扶贫伊始,相关部门应到每个家庭去了解农户的客观需求,去找寻最合适农户的扶贫手段;在扶贫过程中,扶贫部门应在满足农户合理需求的基础上,对扶贫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扶贫供给上,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把供给资源满足农户的个性化需求为手段,增强供给侧资源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才能使扶贫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能可持续发展。

### **(四) 分性别进行多维贫困指数的统计,注重女性决策权的贫困**

分性别进行多维贫困指数的统计是从性别角度出发,描述、分析、研究、判断男女贫困的现象和问题,通过对男女两性贫困的不同原因、扶贫诉求进行差异比较,进而找到满足不同性别诉求的扶贫措施。因此,分性别统计数据的呈现,能帮助扶贫部门持续掌握与分析不同性别的贫困状况,并在扶贫政策制定或资源分配时,融入性别视角来促进两性共同脱贫,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在实践中具体可以做到:一是在现有的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收入统计和贫困数据监测的基础上,同时分性别进行贫困数据的统计,两套数据系统互为补充,并在扶贫过程中对家庭脱贫和性别脱贫情况分别进行评估(陈丽琴,2017)。只有这样,在扶贫工作中才能真正做到性别的精准扶贫;二是关注女性决策权的贫困,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女性参与扶贫决策的权力。在实践中,“各种扶贫决策是通过回应穷人的需要、关注点和发言权,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迪帕·纳拉杨等,2001)在精准扶贫的政策需求中,不同性别的诉求肯定是有差别的。但是,由于女性在决策权维度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带来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女性话语权的丧失,女性的声音在扶贫诉求中被忽视或被淹没,女性的要求没有反应的渠道和得不到回应,这样不仅会带来新的性别不公平,更会影响精准扶贫的效果。因此,关注女性决策权的贫困,采取保障措施让女性参与到扶贫的需求表达和决策制定中来,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让精准扶贫拓宽性别视角,关注贫困主体的不同性别利益需求,关注农户不同性别多维层面的贫困,选择有效措施进行精准化瞄准,才能事半功倍,才能达到习总书记要求的“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 **参考文献:**

- [印度]阿玛蒂亚·森,2001:《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陈丽琴,2017:《旅游精准扶贫中的性别问题识别与性别平等对策》,《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6期。
- [美]迪帕·纳拉杨等著,2001:《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付岩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小林、S. Alkire,2009:《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
- 吴海涛、丁士军,2013:《贫困动态性:理论与实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吴海涛、侯宇、曾燕芳,2013:《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家庭性别贫困度量》,《统计与决策》第20期。
- 杨军、张琴、高帅,2017:《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农村动态多维贫困研究——以山西省为例》,《生态经济》第11期。



杨龙、汪三贵,2015:《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人口学刊》第2期。

张全红、周强,2015:《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财贸研究》第6期。

周慧、文娟,2018:《以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究精准识别与施策——对湖南省72个贫困县的考察》,《经济研究参考》第8期。

邹薇、方迎风,2011:《关于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Alkire, S. & J. E. Foster, 2011,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5, pp. 476—487.

Scheyvens, R., 2000, “Promoting women’s empowerment through involvement in ecotourism: Experiences from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vol. 8, pp. 232—249.

Scott, J.,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 Gender Differences in Rural Household Poverty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Limushan Town in Hainan Province

CHEN Liq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poverty, we have constructed the multidimensional index based on the data of poverty collected from the Limushan Town in Qiongzong County, Hainan Province by following the logic governing the selection, weight determination and summation of the indexes. This index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poverty varies with the gender in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education, health, economy, leisure, social status and right to make decision. Of particular note is the fact that women’s poverty concerning decision-making right is promin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formed by gender difference of different rural households can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s poverty reduction campaign; the big data in this regard can help them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by establish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poverty and having a precise target. This index can also help the government align the supply of poverty reduction with the need of rural households. In a nutshell, the statistics informed by the gender factor can make it possible for us to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in lifting people in rural areas out of poverty and thus achieve a precise poverty reduction.

**Key word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verty; precise poverty reduction

**About the author:** CHEN Liqin, PhD in Management,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